

生命理境与形而上学

——方东美哲学的阐释与批评

◆ 李安泽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生命理境与形而上学

——方东美哲学的阐释与批评

◆ 李安泽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理境与形而上学:方东美哲学的阐释与批评/李
安泽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5004-6268-2

I. 生… II. 李… III. 方东美 (1899—1977) —哲学
思想—思想评论 IV. B261.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6059 号

选题策划 雁 声
责任编辑 黄德志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125 插 页 2

字 数 330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文化融通与方东美

读李安泽君大作《生命理境与形而上学——方东美哲学阐释与批评》，所感所思良多。史称“文以载道”，而道又何其难言也！方东美一生，都在追求诗意、哲学思想与佛教证悟融为一体之道。而其中之关键，则在于追求真善美统一之意境。方东美诗心抱哲，由西方哲学而回归中国哲学，又由哲学而领悟大乘佛教。方氏此一心路历程，既是思想文化多方会通与融合，又是对生命本真之深切体悟。显然，正是此一心路陶铸方氏之为大家。研究如此大家哲学之思，其意义与价值自不待言。安泽君请吾为其书作序，因之，有如下难言而又不能不言之言。

(一)

如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思想文化交流、会通与融合，随之也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虽然由于各民族思想文化存在异质性，使得这种交往在开始阶段难免不发生冲突。但是，从历史发展具体过程看，这种冲突不过是“不打不相识”，不过是会通与融合之前奏。当然，必须看到，会通与融合绝非易事。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因素，其过程不仅漫长且充满痛苦。例如，佛教早在汉代就传入中土，但经过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历

尽无数冲突，才逐渐结出与中土思想文化融通之硕果。此时，不仅产生出具有中国特色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宗，而且也给中国思想文化注入活力。从历史经验可知，佛教与中国思想文化融通乃是一种“自然史”过程，绝非任何外在强制所能成就。同时，推动这种“自然史”发展，还有赖于天才人物出现。就禅宗而言，如果没有达摩到中土真传，特别是没有六祖慧能这样大的天才人物出现，也断不会成功。因为那时，无论佛教在中土之革新，还是中国思想文化新面貌之纷呈，都不能不归功于慧能等等天才人物对佛与儒道之双向扬弃。

至于说到中西思想文化会通与融合，从明末清初已经拉开大幕。明末大思想家徐光启极富远见，早就提出“会通以超胜”这一正确指引。但可惜，这一指引却长时期得不到践行和实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明末清初之时，封建社会已经日趋腐朽没落，从而也已经失去汉唐时代那种强盛与海纳百川之博大胸怀。所谓康乾盛世，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骨子里已经变得十分保守。特别是清末民初之时，中国已经陷人为列强瓜分的危亡境地。在救亡压倒启蒙形势下，当时大部分精英反思中西思想文化及其所获认识，不仅比较肤浅，而且多陷入两极片面性。几乎把西方思想文化看得完全先进，而又几乎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看得完全落后。事实上，进入20世纪时，“西方中心论”在西方已经开始动摇，受到反思和批判，但在中国却备受宠爱。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简单抛弃，所以也就失去与西方思想文化融通之根基。因而，只能是以西方思想文化取代中国思想文化，采取所谓“一边倒”政策，不是倒向苏联，就是倒向西方。以至于“拿来主义”成为20世纪中国主要思想文化餐饮。今日学界所谓“西方话语霸权”或中国思想文化“失语症”，可以说都源于这种“拿来主义”或“吃现成饭”。

(二)

不过，在 20 世纪“西方中心论”阴影下，仍有少数学者，坚守中国思想文化本位和力图践行“会通以超胜”。这又很值得庆幸。现在看来，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思想文化远航之灯塔，在中国思想文化从“拿来主义”回归原创这一艰难历程中成为先行者。这其中，主要包括章太炎及其门下部分弟子，还有诸如陈寅恪、胡适、金岳霖、冯友兰、贺麟、钱穆、熊十力以及唐君毅、张君勱、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之“新儒家”及其弟子们。这些学者中间，金岳霖与贺麟两人，一般只知前者为逻辑学家，后者为黑格尔哲学专家，其实他们思想文化根底都基于中国天道之思，同时他们都还试图使中学与西学会通而求创新。以金岳霖先生为例，他在《论道》书中有一段话，对于中国哲学最高理念“道”，就体会得极为深切。这种体会生动地体现出他坚持中国思想文化本位之立场。他说：“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之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对于这样的道，我在哲学的立场上，用这些年所用的方法去研究它，我不见得能懂，也不见得能说清楚，但在人事的立场上，我不能独立于我自己，情感难免以役于这样的道为安，我的思想也难免以达于这样的道为得。”^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金先生这段话也充分表达出，他与那些坚持中国思想文化本位并在会通中追求创新诸学者所共有之心声。

^① 金岳霖：《论道》，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16 页。

(三)

然而，由于海峡两岸长期隔绝及其他复杂因素，使大陆学术界在相当长时间里，忽略了一位重要学者。他可与上述学者并列而且还有其独特贡献。这位学者就是方东美先生。好在，其人其思，当下已为李安泽君在其书中系统描绘与论述。就东美先生而言，由于他具有诗人天赋，其灵性与悟性甚敏，同时又由于经过在西方留学，具有严密逻辑思维训练，从而使他对于中学与西学之真谛，都有独到领悟和把握。首先，他对于中学与西学都能作出深入批判，所以他不仅能见出各自所长，也能见出各自所短。他没有因为西方先进发达，西学处于强势，就忽视它之所短。他也没有因为中国落后，中学处于弱势，就不重视它之所长，放弃中国思想文化本位。这些都表明，东美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确实具有过人之洞见和非凡贡献。也正因为如此，他能为中学与西学会通开辟路径，并能把柏格森、怀特海（包括海德格尔）与中国易、道之思加以融合，张扬机体主义，创造出其生命本体哲学。

东美先生在哲学研究和创造中最可贵之处，或者说能成就其一代大哲之处，主要在于他具有诗人之敏悟和哲人之批判精神。就后者而言，这种批判精神乃来自双重领悟，既来自中国易道忧患意识，也来自德国古典哲学教养。事实说明，惟有批判精神，能使人超越已有之定见，能发现事物固有之矛盾。或者说，能提出新问题，开辟思之新路径。进入现代，当许多人都沉溺于宋明理学之时，东美先生却能从儒学整体出发，以批判眼光指出，不仅汉儒董子倡导“天不变，道亦不变”和儒术独尊使儒学僵化，而且宋明理学死抱住“道统”不放，倡导所谓“存天理，灭人

欲”，也使儒学在摧残人性中变得僵硬和面目可憎。他由此认为，中国哲学研究不能自宋明儒学接着讲。反之，应当首先回归。因为在他看来，儒家、道家之真正活水源头乃在原儒原道。因此他不仅追溯到先秦儒道之思，而且进而追溯到易经和尚书时代原儒原道之思。

在中外哲学史上，有一种普遍思路为许多大家所采取，那就是在创造性研究中，总是要一再回到哲学思想发展的源头，在那里寻找创新启发。例如，黑格尔对哲学史情有独钟，特别是把古希腊看作西方思想家园，而且也正是他在对古希腊哲学史反思中，首先唤起他系统思辨之思。海德格尔也是把 Sein 意蕴追溯到古希腊，才揭示出其本真意味，从而在他哲学创造中能深刻揭示出生存之本真。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儒家崇敬并追寻周公和尧、舜、禹之思，墨家把大禹尊为至圣并以之为榜样践行之，道家向往和追寻远古“至人”纯真情境，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中国先贤总是从思想源头寻找他们自己原创之启迪。由此可知，回归和反思思想源头，不仅不是复古，而且乃为思之真正创新所必须。不难看出，东美先生也正是沿着这样思路焕发其哲学创新之思。仅此一点，就值得今日哲人深思。

(四)

安泽君在本书对方东美思想意蕴所作全面系统论述中，有许多受方氏启发而与其相通之处。这说明他首先是在学习感悟基础上起步，而非首先就将方氏其人其思作为批或评之对象。这点很重要，但却为今日许多研究者所不重视。在作博士论文阶段，安泽君就抱着诗意感悟心态走近方东美。而本书则是在此基础上另起炉灶，从而能使之研究比其博士论文更加扩展与深化。如果说

成就方东美其人其思在于其批判性格，那么安泽君在本书中所显示者，也正是这种与方氏相通之批判性格。安泽君在充分揭示和肯定东美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重建中所作杰出贡献同时，总是不放松揭示东美先生哲思内涵之矛盾，并给予恰当批评。在安泽君看来，方氏哲思根本矛盾就在于，一方面，他在正确反对“西方中心论”和坚持中国思想文化本位同时，却在后期把中国思想文化本位推向极端，而导致“东方中心论”。另一方面，他在揭示和批判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中心论”，特别是批判其科学主义等“现代性”所导致种种危害时，却没有历史地和全面地看待“现代性”问题。

应当说，从哲学高度揭示西方科学主义等“现代性”问题之思想根源，东美先生揭露与批判西方“主客二元”与这种形而上学“超绝”建构之虚幻等等，都表明他之中西比较研究，已入非常深刻之境，能真正通透问题实质。就此而言，方氏所作批判，与现今西方后现代思想家们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解构，完全可以沟通。而且，两者对这种形而上学“超绝”建构之虚幻，在批判中缺乏历史感和深入理论分析，也相当一致。实际上，“现代性”诞生在“文艺复兴”时期，不仅对解构中世纪封建主义具有合理性，而且也为西方乃至今日世界走进现代化发展提供一条必由之路。当然，把“现代性”绝对化，鼓吹理性至上、科学万能和“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说把“现代性”异化，使之从合理变成不合理，则必须加以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应当是剔除“现代性”异化之不合理性，恢复其固有合理性，而不是对之完全否定。

(五)

安泽君能把方东美思想放在 20 世纪中西各种思潮大背景下加以评析,也表明他对方氏世界眼光非常青睐并能借鉴。从东美先生哲学诞生之著作《哲学三慧》到他后期代表作《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都能见出他之这种世界眼光,乃根源于他对中西整体思维的领悟和把握。就《哲学三慧》而言,他不仅能以整体观考察古希腊理性精神与哲学、艺术,也能以整体观考察“文艺复兴”以降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潮,而且还能把前述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思想文化在整体上加以比较。虽然这时他还没有明确提出“东方中心论”思想,但由于他认为中国“天人合一”或“广大和谐之道”,乃是向西方“主客二元”之思挑战,并且是解决其“超绝”虚幻之“解药”。由此不难看出,“东方中心论”这一极端思想在这里也已见其端倪。可知,方氏整体思维或整体观,虽然有西方哲学影子,但主要源于中国传统《易经》、儒家与道家“天人合一”之思。而到《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发表之时,则“东方中心论”思想在方氏那里已经通过生命本体哲学建立,而得到清楚描述和理论论证。安泽君在其书中对方氏这一思想发展过程,作出精到评述,极富启迪性。不可否认,“天人合一”之思,确实很伟大。作为动态整体观,它对大视野和高境界之开拓,至今仍然在启迪世人。这一思想具有诗意混沌性,使之与西方思想具有理性、明晰性本质不同,属于另一类。但正是这种诗意混沌性,却具有原创性之能动,具有超越理性明晰僵化之功能。然而,尽管“天人合一”如此伟大,也绝非万能。相反,因“天人合一”之伟大,视之为万能,狂之为“东方中心论”,其结果只能与“西方中心论”同样陷入荒

谬。此一理论结局，不能不说是方氏理论追求“过犹不及”之一大遗憾。

(六)

方东美具有诗人性情和气质，从诗到偈都能写得意境高远而深邃。同时，正是这种性情和气质使其哲学能放射出启发人之多彩慧光。这对于安泽君似乎也有感染。以致在其书第一章，对于方东美身世、思想文化背景与历史渊源，作者所作生动阐述，就多有饱含浓郁诗情之笔。读之，令人心动。因为，正是这种诗情之笔，使读者与东美先生距离得以拉近。海德格尔在其著作中给诗与诗人以崇高地位，他指出在“诸神已经远去”之时，只有诗人能在其诗中追寻“神迹”。毫无疑问，神之神圣在各民族中，本质上都意味着人间真性情之升华与神圣化。而诗人能借诗追寻“神迹”，从一方面正好说明，诗当然是好诗，乃是人间真性情之浓缩或爆发。所以，惟有好诗，惟有诗情，能超越世俗而通向神圣。由此亦可见出，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天人合一”因其诗意混沌性而具有重要价值，决不可以忽视。安泽君之书，点出方东美诗人性情和气质，并在阐述中以诗情之笔回应，使得此书开篇就引人入胜。不过，在当今中国哲学界，理性主义仍占主流。谈到“诗意”，似乎就会被视为离开哲学。虽然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已经把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传统解构，并且正在借助“诗意”超越性，开拓出思想文化多元视野和途径。但是在中国大陆，具体谈“诗意”与哲学关系，仍然有被视为不正常之嫌。就此而言，今天能把方东美诗人性情与其哲学关系问题提出来，就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 * * * *

作为序言，已经写长，虽说意犹未尽，也当结束。不过，在这结语中，还想对上述作一点申明。本书始于思想文化融通问题。此一问题特殊重要，就在于古今中外思想文化发展都离不开该问题之合理解决。融通必须立足于民族文化本位，此之为前提。本位失之，则无融通可言，只能流于“拿来主义”。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其所以处于“西方中心论”阴影之下，皆因热衷于“拿来主义”。而在阴影中能特立独行者，能坚守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本位者，就显示其远见与弥足珍贵。上述列举诸学者，包括方东美，贡献与可贵之处，皆归因于此。至于中西两种思路，西方“主客二元”形成理性逻辑思维，在哲学上表现为实体论形而上学；中国“天人合一”形成诗意之“象思维”，在哲学上表现为非实体论之天道形上学，在世界思想文化发展史中，乃是各领风骚。两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此两者可以互补，而不可以诉诸“西方中心论”或“东方中心论”之各自“独尊”。我以为，此中正道当尊行如此。

老 树

2007年1月8日于京西稻香湖畔，二稿成于1月15日

目 录

| | |
|-------------------------------------|------|
| 序：文化融通与方东美 | (1) |
| 绪论 | (1) |
| 第一章 求索东西天地间 | |
| ——方东美的学术思想历程 | (25) |
| 一 早期的读书生活 | (26) |
| 二 中期的蹉跎岁月 | (35) |
| 三 晚岁的传道授业与学术生涯 | (47) |
| 第二章 本体与方法 | |
| ——方东美哲学的本体意识与方法意识 | (60) |
| 一 方东美哲学的理论背景与思想方法 | (61) |
| 二 方东美哲学的中心问题与论旨 | (69) |
| 三 “生生之德”：以生命为中心的本体论哲学体系 | (78) |
| 四 “广大和谐”：机体主义方法论和多元统合的整 体观 | (85) |
| 第三章 知识与价值 | |
| ——方东美的哲学观兼论科学与哲学之关系 | (98) |
| 一 “衡情度理”：方东美的哲学境域 | (99) |
| 二 方东美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其对科学主义的 | |

| | |
|-------------------------------------|-------|
| 批评 | (107) |
| 三 方东美的价值理论及其批评 | (116) |
| 第四章 天人之际 | |
| ——方东美天人关系思想与人格成长理论 | (128) |
| 一 中西天人思想之歧异 | (128) |
| 二 人格发展的多重进路 | (138) |
| 三 人与世界在理想文化中的蓝图 | (147) |
| 四 方东美天人思想之评价 | (152) |
| 第五章 “哲学三慧”与“文化四相” | |
| ——方东美比较哲学思想 | (158) |
| 一 “生命情调”与“哲学三慧” | (159) |
| 二 “三慧”分合的多维层面 | (167) |
| 三 “互助”与“拯救”：关于世界文化前景的两重 心态 | (177) |
| 四 方东美比较哲学思想略评 | (185) |
| 第六章 “内在”与“超越” | |
| ——方东美论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 | (192) |
| 一 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哲学之精神 | (192) |
| 二 中国哲学的通性与特点 | (199) |
| 三 中国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与前景 | (206) |
| 四 方东美中国哲学思想之总体评估 | (212) |
| 第七章 生生而和谐 | |
| ——方东美儒学思想及其现代意识 | (218) |
| 一 儒家哲学的通性与特点 | (218) |
| 二 原始儒家哲学的高度精神 | (222) |
| 三 汉宋儒学精神之失坠 | (228) |
| 四 “道统”与“学统” | (231) |

| | |
|------------------------------|-------|
| 五 “扩大范围讲儒家” | (237) |
| 第八章 菩提道与圆融美 | |
| ——方东美佛学思想及其现代精神 | (242) |
| 一 “亦宗教亦哲学”：创造性的佛教诠释学路径 | (243) |
| 二 “圆融和谐”：中国大乘佛学的根本精神 | (246) |
| 三 “中国大乘佛学的前奏” | (249) |
| 四 “中国大乘佛学的全幅发展” | (252) |
| 五 华严宗：“广大和谐的哲学” | (256) |
| 第九章 超脱与逍遥 | |
| ——方东美道学思想及其哲学之道家神韵 | (266) |
| 一 道家哲学的特质 | (266) |
| 二 老子哲学 | (273) |
| 三 庄子哲学 | (280) |
| 四 方东美哲学的道家神韵 | (287) |
| 第十章 大德新运，学林新局 | |
| ——方东美与中国现代哲学思想 | (295) |
| 一 方东美的学术传承与流派 | (295) |
| 二 方东美对中国现代哲学思潮和流派的批评 | (308) |
| 三 方东美哲学思想的历史定位与评价 | (318) |
| 参考文献 | (329) |
| 后记一 | (335) |
| 后记二 | (337) |

绪 论

中西哲学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中国现代几乎所有创造性哲学家都在这一领域作出了自己特殊的理论建树和贡献。方东美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哲学家。他不仅以其原创性的哲学体系独树一帜，而且以其独特的学术历程和致思路线，享誉学林，并对当代学术思想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在 20 世纪中国现代哲学家群体中，方东美是一位卓立特行，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为中国哲学的现代转折与创新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与努力，并以其宏富学养和睿见卓识赢得了“一代大哲”的美誉。方东美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与现代意识的哲学家。他一生潜心研究哲学思潮，冀能了悟其源流正变。他深入西方哲学堂奥，又自觉地回归于中国哲学，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学术探索历程。有论者指出，方东美的哲学路线代表了一种“先理解西方，再回头重建传统”的精神方向，所谓“后五四建设心态”。方东美哲学体现了融贯东西，含摄众家，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特征，代表了中国哲学在现代条件下寻求重建与发展的一种尝试与方向。他通过比较哲学研究，最终回归于中国文化本位。因此，他重建中国哲学传统的工作具备了世界总体文化的宏阔背景，有着深远的文化意蕴与现代意识。他强调讲中国文化传统，应该诸

家并重，虽然他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精神之主脑，但他并不赞成定儒家为一尊的做法，尤其反对“道统”观念。他不同意“接着（宋明儒）讲”的路线，而是把眼光投向中国哲学的原点。他的生命本体哲学的标出，表明其哲学创构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可见，方东美哲学确实具有开创性特点，他为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和方向。

—

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潮错综复杂、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中，文化保守主义以其传统文化的本位立场和文化建构的创造精神，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他们在中西文化激烈交锋，诸家争鸣，竞领风骚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总体格局下，另辟蹊径，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位立场，同时吸纳西方哲学，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折开辟出一条通道来。方东美的哲学创新活动与文化保守主义在精神方向上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现代哲学思潮中，方东美以其独创的哲学体系，富有个性化的思想和独特的治学路径，成为“独树一帜、壁立千仞”的人物。

方东美是在中西融合的背景下从事哲学思考的。他的哲学研究具备一个深广的比较哲学的理论视野。他在哲学探索中，走出了一条在东西方融会的交点上重建中国哲学的路径。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和传统文化的严重危机，他明确地反对任何全盘西化的主张，也不同意“接着（宋明儒）讲”的路线，如冯友兰、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人物所主张的，借用西方哲学的一些方法（主要是逻辑分析方法）致力于传统哲学（主要是宋明理学和心学的哲学体系）的重新诠释与复兴。他主张，要在全面深入地了解、认识中西文化传统的前提下，融会贯通，重建中国哲学传